

著作，作者的文學修養令人贊賞，尤其是在每章開頭以及行文中穿插的中國古典詩文的英譯，體現出在中英文語體轉換上高超純熟的技巧。在史料運用上，不但大量使用族譜、方志、詩文集等常見材料，更通過謝蘭生的《常惺惺齋日記》中飲宴唱和的網絡，以及沈復《浮生六記》中關於沙面花艇的章節等重現19世紀的廣州都市景觀，這些都是一部歷史著作中非常生動別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讀罷本書的一點餘思是，作者對19世紀廣東文化精英的社會流動和身份認同的研究是從地域和宗族角度出發的，尤其是談及九江學者朱次琦時，作者認為朱以「九江」為「號」是別有深意的，表達了朱次琦對自己九江身份的重視。事實上，在中國古代，文士以出生、居住或任職的地名為號並不少見，例如「賈長沙」（賈誼）、「韋蘇州」（韋應物）、「柳柳州」（柳宗元）等，相比起陳澧的「憶江南館」，「朱九江」所承載的身份認同意義似乎並不十分明顯。究竟「九江朱」是一種過度闡釋，抑或其實在中國古代以生地或任職地為自己命名的傳統中早已包含了身份認同的意味，並有可能進一步從地域、學術、身份的角度加以剖析，這是很值得後來者探尋的。

黎恩

中山大學中文系

周建新，《動蕩的圍龍屋：一個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與文化抗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12，3，3，456頁。

尚未開卷，《動蕩的圍龍屋：一個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與文化抗爭》一書的封面即給人以視覺上的衝擊：一座古樸的圍龍屋在高樓大廈的包圍和逼視下頑強地屹立着。這幅圖景巧妙地提示了本書的主題，即在現代化城市建設與歷史文化保護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的背景下，作為客家歷史和文化的重要載體和象徵的圍龍屋如何生存和發展。

圍龍屋是客家人聚居地區的典型建築，被譽為中國五大傳統民居建築之一。隨着時間的推移，圍龍屋日益失去了最初的一些功能，然而其特殊的文化意義和象徵價值，使得它依然在客家人心目中佔有很高的地位。位於粵東K城城中村——鍾村的壽山公祠就是這樣一座圍龍屋，自建立三百多年以來，它既有過熱鬧輝煌的場面，也有過冷清肅靜的經歷。2003年3月，一紙突如其來的拆遷公告宣布這座古老建築的滅頂之災。這個祠堂的擁有者鍾姓人奮起

抗爭，自發組織起來抵制拆遷，一場政府與鍾姓人長達數年的較量遂由此開始，書中稱之為「護祠事件」。作者採用「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路徑和「文化抗爭中的相互建構」的分析框架，重點闡述了「護祠事件」的原因、過程、特點及其社會文化意義，深入分析了客家宗族社會與現代變遷、文化保護與城市化等問題，探討了文化抗爭背後的心理活動、行為方式及策略手段，回應了人類學關於文化傳承及其機制的永恆主題和傳統文化研究及保護的時代主題。

全書共十章，可分為五部份。第一部份為緒論，簡介本書的主要內容、基本思路、篇章結構、研究方法、寫作方法、資料來源以及作者的田野歷程。

第二部份為研究設計和調查社區介紹，其中第一章「圍龍屋內外的文化抗爭」介紹了研究緣起、已有研究回顧和文獻綜述，闡述了全書的理論視野和分析概念。第二章「鍾村印象」為鍾村社區歷史與現狀的介紹，重點在於描述鍾村從傳統宗族社區向「城中村」的轉變，為護祠事件的發生作鋪墊。

第三部份是本書的主體，包括第三至第七章，分別以護祠事件的發展進程和圍龍屋作為分析的時間和空間主軸，對護祠事件進行了「深描」，生動細緻地展現了鍾村村民如何保護壽山公祠、州司馬第等圍龍屋結構的祖祠的具體過程。其中，第三章「護祠事件的初始」講述護祠事件的由來和準備，介紹了鍾村房屋拆遷的由來，鍾屋人為保護祖祠而成立護祠理事會組織，以及所進行的初步動員。同時，在不同的場合將護祠事件的主角鍾校長、老鍾等人不失時機地推出，使他們順理成章地「粉墨登場」。第四章「護祠事件的發展」描述了鍾村村民們對待拆遷的矛盾心態和鍾屋人、廖屋人的護祠鬥爭，結果以「驃馬」、「文魁」的被拆和壽山公祠、州司馬第的保留而暫告一段落。第五章「護祠事件的高潮（Ⅰ）」是護祠事件的轉折和變化，由原來的「告官」、「求官」等訴諸政府的形式改變為「自保自救」，立足於宗族自身力量，並積極尋求社會力量的支持和聲援，新春團拜會、勿圍公祖牌登座、護祠理事會的改組、《羊城晚報》的報道等接二連三的大事，使護祠事件進入了一個高潮期和興旺期。第六章「護祠事件的高潮（Ⅱ）」以壽山公祠的修復和開發建設為主要內容，包括牌匾仿製、出國募捐以及宗族內部的不和諧之音，使護祠事件由最高點緩慢地下降，泰國募捐未果、錢哥的離去、閒言碎語是導致護祠陷於沉悶的主因。第七章「護祠事件的餘波」，是一個尚未結束的結尾，熊屋重光慶典活動的熱鬧與宏大，使鍾村鍾屋人深受刺激，一年一度的春節祭祖使壽山公祠再度興旺，而鍾氏文化研究會的籌備

與成立，則使鍾屋人的文化經營擴展至更大的空間，壽山公祠和鍾姓宗族也在沉寂中迎來了新春。

鍾村護祠事件以動態的、鮮活的事例表明：當地方社會的自我認同與代表其歷史和傳統的建築物一同被破壞時，地方社會並非只能坐視其發生、無動於衷。地方社會可以重組、發動、借助自己的傳統資源，可以採取行動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且這個過程可以以一種完全現代化的方式來實現，例如借助媒體，利用其自身的國際聯繫、海外資源和象徵資本。在發動資源的過程中，地方社會實際經歷了一個構建和創造、再造的過程。面對現代化、城市化的衝擊和擴張，傳統文化沒有消失、中斷，而是繼續作用，甚至在許多層面強大和復興。這樣，通過拯救自己的過去，地方社會「收復」了現在，並且可以在未來社會建設中承擔更加積極的作用。

第四部份為全書的學術總結和進一步討論，是在田野民族志深描之後的分析和提煉，包括第八至第十章。其中第八章「鍾村文化抗爭的話語體系分析」是對護祠事件的小結，在對事件進行全程縮微回顧的基礎上，先後重點介紹了鍾屋人進行文化抗爭的「公理」和「私理」為主的原因和動機；以宗族為主體，包括專家學者、記者媒體，以及文博、信訪部門等參與的多元混合體的抗爭力量；問題化，多重話語靈活運用，以退為進、自保自救，抓大放小、有的放矢的抗爭策略；上訪信訪，集會慶典，廣泛宣傳，串連發動，阻拆等抗爭手段。最後對文化抗爭過程中所體現的多元利益博弈予以總結、分析，並力圖呈現不同階層、不同行動主體對於護祠事件的態度與意見。第九章「鍾村文化抗爭的結果與啓示」探討了文化抗爭的結果與影響。隨着護祠事件過程的動態展開，特別是在文化經營的策略下，宗族已不僅僅是基於血緣關係的地方社會的組織單元，同時也作為一種觀念和話語被創造和實踐。這時的鍾姓宗族既是文化抗爭的手段，也是其結果。作者將這種因突發性事件所引發、在內外合力作用並具有諸多新特點的宗族形態概括為「重構宗族」，以區別於一般意義的「復興宗族」。此外，無論是宗族重構、文化認同還是社區營造等文化抗爭的產物，都是傳統的創造或文化再造，是向傳統、文化尋求和汲取資源的具體表徵。作者尚意猶未盡，在第十章「進一步的討論」中簡要討論了空間的力量、祖先的威名、精英的作用、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文化抗爭與文化保護的關係等與本書主題密切相關的重要問題。

第五部份為資料附錄，彙編了包括上訪信、政府公函、海內外宗親來往信函、會議記錄、新聞報道、碑銘、族譜等各類官方資料及民間文獻，其價值自不待言。

本書是目前中國知識界運用權力技術分析方法較為成功的作品之一。作者恰當地使用了當代西方人類學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新概念，如「象徵資本」、「文化資源」、「文化聯繫」等，並在西方的社會運動理論和中國學者的維權抗爭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文化抗爭」和「文化經營」這兩個核心概念。所謂文化抗爭，指為爭取社會和文化生存，借助文化資源和文化力量來進行的抗爭。這一概念明顯區別於那種以實際經濟利益和政治要求為出發點的抗爭，更符合書中敘述的事件本身的性質和特點。文化抗爭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抗爭目標是文化層面的對象。在鍾村護祠事件中，使鍾屋人奮起抗爭的「理」在於壽山公祠、州司馬第等古老圍龍屋是祖產，是文化建築。第二，抗爭策略和手段是文化上的，它借助文化的力量和文化資源，並使其技術化、權力化。鍾屋人策略性地運用客家、風水、歷史文化遺產等文化概念和知識，以及對學者、媒體等社會文化資源的借助，如學者將壽山公祠鑒定為歷史文化古蹟的認定。第三，抗爭的主體是多元的社會文化階層。在鍾村護祠事件中，除了鍾村人、鍾屋人這些主要的抗爭主體外，諸如專家學者、記者媒體等中間力量越來越多。第四，抗爭的過程和結果具有生產和再生產性。（頁3）所謂文化經營，即以文化為對象的經營，在實踐過程中對傳統文化資源的利用，其核心是意義和權力的創造、生產和使用。在本書中，它特指在現代化、城市化脈絡和城市拆遷情境下，拆遷戶如何操弄和經營宗族、圍龍屋、客家、風水、歷史文化遺產等文化資源和抽象概念以對抗和應對政經情勢的變遷，以及在此過程中各個行動主體之間的博弈、互動（頁4）。就本質而言，文化抗爭也是象徵鬥爭，文化經營就是文化的生產或再生產。

《動蕩的圍龍屋》也許非常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中國的處境，但在改變這種處境方面卻顯得蒼白無力。書中的鍾村「護祠事件」得到了滿意的解決，是個成功的範例，但這樣的事件會在「廖村」、「謝村」或別的村出現。在鍾村人抗爭的過程中，新的人物、新的細小事件、新的權力關係不斷涌現出來，但這些因素的出場實際上受某種力量控制。我們看到抗爭中的鍾村人和處於他們對立面的政府官員一樣，分享着國家意識形態提供的話語資源（同樣的政策文件、同樣的國家認同、同樣的國家利益論）。作者過於關注日常生活，刻意追求細節的真實，忽視了文化抗爭背後最具支配作用的政治體系和最為明顯的結構性力量。

謝宏維

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